

导 言

中国近现代技术的发展历程，不是一部发明史，而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土化的进步史。其中一条主线是国外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截至目前，国内学者主要是按照‘中国技术发展史’的思路描述西方技术的引进、中国人对外来技术的掌握和取得的技术成就，重点是描述技术成就，再适当地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本书试图从“技术转移”这一视角探讨 20 世纪 50—60 年代现代技术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①

一、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问题及有关研究

什么是技术？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哲学家的定义比较抽象。工程师的解释一般比较具体。我们倾向于这样的定义：技术是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技术的内涵很广，既包括具体的技艺、窍门、设计、制造工艺等，又包括技术科学(technological sciences)。技术科学通常是指工程科学和农业科学。现代技术是企业竞争的實力所系，是国家间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竞争与斗争的直接手段之一。本书所讨论的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由苏联转移到中国的技术，特别是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技术。

什么是技术转移？技术转移是指通过有偿和无偿的各种途径，技术从一国流向他国的活动和过程。^② 它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政治、科学、文化诸

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中国也取得了技术上的进步和成就，但这不是本书关注的主要内容。同时，本书研究的地域范围限于中国大陆。
沈越，鱼金涛国际技术转移概论 4。

因素的复杂的社会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① 技术转移一般发生在拥有某种技术的国家与没有这种技术或拥有相对落后的同类技术的国家之间。技术转移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国外学术界对技术转移做过很多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而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技术转移问题，所做的研究基本上从经济学角度，而不是史学角度。

17—18 世纪通过宗教渠道，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了钟表、火炮、天文仪器等西方技术。西方近现代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则始于 19 世纪中期，大致经历了四个由政府倡导或组织的阶段。^② 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 60—90 年代的自强运动期间，欧美的船舰与兵器制造技术以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纺织等技术向中国通商口岸和少数内地城的转移。在学科门类方面的缺陷很多。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40 年代末的国民政府时期，美国和西欧的兵器、航空、机械、电工、矿冶、交通、通讯、纺织等技术向中国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的转移（包括技术教育），因战争的破坏而远未实现预期的目标；日本技术则向东北等占领区转移，具有显著的殖民地色彩。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包括产品制造、研究与开发、技术教育、体制建设等各个环节和各主要学科门类的建设，使中国技术和工业化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第四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使中国技术阶段性地提升了水平，培养了技术和工业的竞争力。

当然，这个划分不是绝对的。在此期间也持续地进行着规模和程度不等的技术转移。比如，20 世纪初期，西方和日本的民用技术通过外商和私营企业向中国沿海和其他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转移；处于割据状态的

康荣平，技术转移的若干理论。

本书所讨论的“近现代技术”是指从西方工业革命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技术。中文“近代技术”和“现代技术”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学术界也没有一个被大多数同行接受的定义。本书尽量少用这两个中文术语，即使使用也用比较模糊的措辞“近现代技术”，其含义是英文的 *modern technology*。本书中的“中国近现代技术”是指转移到中国并在这里继续发展的世界意义上的 *modern technology*。本书作者以为，尽管技术必然受到文化传统和应用条件的影响，但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技术和技术科学只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地区差异，以及不同的适用性和文化个性，而在纯技术意义上并没有大的本质差别。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这一特征越发明显。

军阀政权则引进了兵器和飞机制造技术，以及少数其他产业技术。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某些西方制造技术和化工技术等转移到中国大陆，而美国技术则自 50 年代起不断向台湾省转移。^①

国内外学者对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做了很多研究，其中不乏有关技术引进的个案研究成果，但却缺少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相比之下，有关民国时期技术和工业化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分散。20 世纪的行业史、志如《当代中国》）对民国时期的技术有或多或少的描述，但大都被当成衬托 20 世纪建设成就的附属材料甚至失败的典型。殖民地技术的状况就更少引人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科学技术受到国内学术界、政界和文化界普遍关注，人们为“两弹一星”等成就津津乐道。相关的论著侧重于描述和褒扬技术成就，而深层次的学术探讨却明显不足，原则上比较淡化或回避苏联的技术援助。而事实上，50 年代与苏联结盟，引进苏联技术是当时中国政府的重大战略举措。苏联的技术援助推动了现代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奠定了中国现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基础，初步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技术和工业体系对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这段技术转移史的研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中国科技史课题，也是国际技术转移的一个研究个案。

苏联学者对中苏经济、技术、科学、军事等合作的回顾和研究要比中国人早得多。他们多是从苏联援助中国的角度来评述那段历史。在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东方国家科学技术史编》上，1960 年基谢廖夫 И. Н. Киселев 发表了“中苏科学交流”一文。^②该文根据苏联科学院的档案材料，描述了苏联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在 1949—1960 年的交流。克罗契科撰写了《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1963）一书回顾了他 1958 年在中国参加援华工作的经历、见闻和感受。1975 年菲拉托夫 Л. В. Филатов）所著的《中苏科学技术合作（1949—1966）》在《中苏关系通报》1975 年第 65 期发表。^③其另一部专著《1949—1966 年苏联对中国

① 在本书中，凡只提年代而不提世纪的，均指 20 世纪的年代。

② И. Н. Киселев.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связи. 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ка. Вып. 2, 1960г. Стр. 12.

③ Л. В.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 №65.

科学技术援助的经济评估》试图阐述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西方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做过介绍和研究，有的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苏联科学技术对中国的影响。美籍华人学者郑竹园在 1965 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力资源》（Cheng, Chu-yuan,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Man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3*,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一书中给出了 1 200 名中国科技界骨干的传记材料，列出了苏联援华的主要专家的姓名和所从事的专业，评价了苏联在中国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参加过中苏的经济贸易谈判，参与过一些重要的中苏合同的执行。他自 1957 年开始出版有关中苏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交流的研究文章。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7 年出版了他的《苏联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①。该书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和研究文献，利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数据来论证苏联援助的意义，同时，该书附有 23 套原始合同文本及中苏贸易统计表。1979 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斯拉德科夫斯基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交通、贸易和财政》（1949—1975）一书，述及到 50 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70 年代初，苏联“思想”出版社出版了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合著的《苏中关系》。该书的英文本 1975 年在西方发行，三联书店根据 1980 年增订版翻译的中文译本于 1982 年在中国问世。该书的主要作者鲍里索夫是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的拉赫马宁（О. Б. Рахманин）即中苏关系专家罗满宁^②。他曾经在中国从事多年的外交工作。《苏中关系》利用了苏联官方保存的档案资料，反映了苏联当局的基本观点。尽管该书不被认为是“对问题的客观研究”但“一般说来作者避免夸大”^③。书中多次提到苏联在科学技术和工业方面援华的举措及所发生的问题，包括对中方的指责。

① 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 1977г.

②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ка КНР: транспорт, торговля и финансы (1949—1975). Москва, 1979г.

③ 2002 年莫斯科历史思想纪念碑出版社出版了拉赫马宁的著作《苏联—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

④ 彼得罗夫所写的英文序 见 鲍里索夫 科洛斯科夫, 苏中关系 (1945—1980). 542—546。

如果将书中内容与中国保存的资料及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相互比较，那么这部书对技术转移史研究是有帮助的。

苏联（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汉学家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多次出任苏联驻华外交官，有机会与当时中国的高层决策者接触，了解苏联对华的基本政策。他 1992 年撰写的《中国在我的生活中》由俄罗斯“科学”出版社出版^①。这部书从外交的角度描述了 20 世纪 30—90 年代的中苏关系。

江西庐山图书馆的罗时叙先生参考了大量公开出版物和部分俄罗斯档案撰写了《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1999）生动地描绘了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故事。不过，这已是纪实文学的范畴。相比之下，俄国学者扎捷尔斯卡娅和中国学者沈志华对援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所做的研究和描述则更符合学术规范，论证也严谨。扎捷尔斯卡娅的《苏联专家与中国军事工业之形成（1949—1960）》一书于 2000 年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从已经发表的部分译文来看，该书对苏联专家和中国国防工业技术的建立有深入系统的分析。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是 2003 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新作。该书分四个时期全面描述和分析了苏联专家的援华工作，其中述及许多苏联专家在科学技术、工业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工作。

中俄两国陆续解密一些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文献，为目前中苏关系的研究创造了资料条件，中青年学者的工作将研究引向了深入^②。中外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是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关系，有关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以及中苏美三国之间的关系。李丹惠编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缩影。该文集收录了李丹惠、沈志华、杨奎松、李捷、凯佩尔、冈察连柯、岗察洛夫等中外学者的 20 余篇论文。尽管其中没有一篇是专门探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但多数文章还是触及到苏联的技术援助或相关问题。类似的著作还有 90 年代末出版的德国学者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的《中苏走

①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Китай в моей жизни (30—90 год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стр. 86—126.

② 该书第二章第二节“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梁景河译）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177—194。

③ 牛军，近十年来中苏关系研究的新进展。

向联盟的艰难历程》。作者利用了大量俄罗斯方面的档案资料，澄清了很多问题，有些内容涉及到了经济技术援助问题。

科学技术史论著对苏联技术援华问题做过描述。董光璧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1997）和吴熙敬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技术史》（2000）都围绕着中国技术进步这个思路展开叙述，其中提到 50 年代苏联对华技术援助，但未从技术转移的角度加以系统研究和分析。在上述两部书稿出版之前，曾有两篇关于中苏科技合作和中国引进苏联技术的学位论文。1990 年 6 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沈小滨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试论中苏科技合作的历程及其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影响”^①。该文粗线条地描述和分析了 1949—1967 年中苏两国科技合作的若干阶段、某些重要事件和合作内容。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姚学宁于 1996 年 1 月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中苏建国初期技术引进的比较研究”^②，初步比较了中苏两国的技术引进及其社会背景和影响等。

亲身经历了中苏合作的留苏学生、学者深情地回顾了他们的留学岁月。欧美同学会留前苏联与独联体分会从征集到的 2 711 幅历史照片中精选了 813 幅，组织编辑了大型画册《学子之路——新中国留苏学生奋斗足迹》（2000）。画册附录名单中列出已经收集到的五六十年代 11 068 名留苏学生及其在苏联的学习单位，其中大学生 6 655 名、研究生 2 142 名、进修生 740 名、实习生 1 531 名。

可以这样说，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至目前，几乎没有比较全面的宏观专题研究，但以上论著为认识技术转移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和线索。

2000 年，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启动了一个二级课题，专门研究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问题。然而，在目前学术积累甚少，以及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下，想写出一部详实的技术转移史，对本书作者来说极不现实。我们只能极其有限地收集和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利用公开出版物中有关技术转移的资料，同时重点发掘部分尚未被利用的档案资料，适当补充新的口述史料，进而初步

沈小滨的论文未正式发表。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成智教授提供该文。

姚学宁论文的一部分最近以《中国建国初期的技术引进》为标题，发表在姜振寰主编的《技术史研究》文集中。

勾画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历史概貌，创造一点新知识，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为认识技术转移的过程和机制，本书在结构上采取宏观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概述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基本脉络、主要阶段及不同形式，初步探讨技术与经济、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的互动；另一方面，分别从工业援建、科技援助、高等教育三个领域里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个案，对技术转移做比较微观的描述和分析^①。例如，第一汽车制造厂是苏联援华“156项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它成套地引进了苏联的技术和企业制度，奠定了汽车制造技术的基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是在苏联的全面帮助下建立的科研机构，列入了中苏科技合作“122项”协定，它的建成标志着计算技术在中国的建立；北京航空学院（现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工科高等学府，也是聘请苏联专家最多的院校之一。为了进一步说明苏联的援助，本书第八章将概述苏联专家的某些工作。最后，本书集中探讨若干有共性的问题，以获得点滴历史启发。

本书所用参考文献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档案资料。中国科学院的档案涉及面比较广，既有科学院及其研究所的比较完整的资料，又有反映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和技术转移的文献，内容包括重要决策文件、合作计划及其执行情况、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工作、工作总结和统计报表等。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保存了比较齐全的档案资料，能够反映苏联当时帮助培养人才、制造计算机等方面的详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档案资料中有许多反映苏联帮助建校及其所做工作的内容。不过，该校档案资料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不及中国科学院，有相当部分原始文献散失。《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中也节录了一小部分汽车厂的档案资料。这类资料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个案的描述和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第二类参考文献属于各种公开出版物，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技

① “156项工程”、“中苏科技合作122项”和苏联军事技术援华等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做专题研究的个案。这还不包括像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的大型援建项目。要全面开展细致的个案研究，需要很多人力、研究经费和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

② 汽车技术代表一般的工程技术，汽车工业则是支柱产业之一。计算技术代表高新技术，计算技术研究所是科研机构的一个典型。航空技术与国防密切相关，航空教育是工科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汽车制造厂、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北京航空学院展示了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三类领域和三种渠道。

术引进四十年》、《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苏联科学家报告汇编》等 其中辑录了有关技术转移的重要原始文献；《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鞍钢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十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45 周年》、《中国科学院编年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等研究机构、企业和大学的史志 其主要资料出自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领导人的论著，反映了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领导人的个人观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李越然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等回忆录 在某种程度上对文献记载做了印证和补缺；《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当代中国丛书》若干卷、《中国汽车工业史》等行业史 帮助我们了解行业发展与苏联援助的关系 鲍里索夫等的《苏中关系》、《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等中苏关系史论著，对理解技术转移也是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其他列入本书参考文献目录的有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和当代学者的研究论著 如《中国科学院年报》等。除上述外 本书作者还访问了若干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知情者，获得了部分口述史料。

虽然本书作者在资料的收集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还有相当多的重要史料尚未得到发掘和利用。例如，没有直接查阅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部、原重工业部、原高等教育部、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冶金部、原机械工业部等一些国家部、委、局的档案资料，中国科学院以外的接受过苏联援助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的档案，等等。国防方面的档案尚未解密；而科学技术专家的档案十分分散，且收藏不规范。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存有大量苏联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档案资料，它们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本书没有条件利用这方面的资料，甚至来不及参考已经公开出版的俄文论著。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遗憾。

总之，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内容十分丰富，史料浩繁，这个方向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学术任务。本书作者在规定的三年时间里仅仅收集到一小部分资料，并据此初步勾画技术转移的轮廓。由于只选择了若干个案例做具体的分析，难免给读者以挂一漏万的感觉。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加强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史研究的基础，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一些线索。

二、影响技术转移的若干外交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成了分别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峙和竞争局面。一方面，苏联继续经营并扩大自己的社会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合作，为东欧、中国、朝鲜、印度等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则在亚洲扶植日本、中国台湾、南朝鲜等国家和地方政权的发展，为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以对抗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盟友。

1949年10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次日，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政权，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新中国成为苏联的又一个盟友。

为了多角度地理解技术转移及其复杂的背景，本节简述与技术转移有关的中苏关系的若干重要问题。如果读者欲全面了解中苏关系的演变，建议参阅其他相关论著。

1. 中苏的意识形态认同

中国共产党（以下有时简称“中共”）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后，它的主要领导人所陈述的政治理想、经济纲领等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我们首先从这方面展开讨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直接受到了苏联共产党（以下有时简称“苏共”）的影响，即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长期接受了苏共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和政策指导，将苏共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尊为权威^①。尽管中共与苏共在革命的具体道路和策略、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分歧和怀疑，甚至两党领导人之间曾缺乏信任，但双方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目标和政治理念上却是一致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和政策的指南，中共要走俄国人走过的路，在中国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它坚信，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先进，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取代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

共产国际的政策与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

苏联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迅速建设了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榜样，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毛泽东在设想建国问题时，就要求中共的干部学习《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联共党史》等书籍，借鉴苏联的建国理论和经验^①。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道路不走是不可能的。”

中共和苏共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或接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中苏是否结盟还取决于双方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意识形态最终将要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政府确定对外战略与政策、处理国家关系的现实基础。

2. 中苏政治经济的互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继续争夺中国的政权，美国和苏联则在此争夺势力范围。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沙皇俄国的战略，通过扩大领土，以及在相邻国家和地区发展势力范围，甚至培植抵制美国扩张的力量，来为苏联的安全争取辽阔的空间屏障和时间^②。他从苏联的利益出发，为苏联谋取远东的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通过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④苏联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即中苏共同享有和使用中长铁路，苏联海军用旅顺港作基地，大连变成自由港。美国支持国民党，并向内战中的国民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提供大量援助。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年11月）和其他协定，同时保障美国在华的多项权利。为维护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苏联

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487。

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

^④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商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及其以后的安排。三方在远东问题上商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向日本军队开战，其条件是苏联重新获得沙皇俄国过去在东北的权利，承认外蒙古独立。苏军在东北打垮日本关东军之后，苏联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被限制在《雅尔塔协定》所构筑的远东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内。

十分看重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劝说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苏联也借用中共的力量，在军事装备、物资、后勤保障和人员等方面援助东北的中共军队，以制约国民政府和对抗美国^②。当中共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时，苏联改变对华政策，希望共产党的中国加盟苏联主导的集团，以增强与美国在冷战中的对抗实力。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战，以及战后的经济建设都迫切需要外国的援助，希望能得到苏联的帮助。1947—1948年间，毛泽东曾计划访问莫斯科，希望讨论重建工业，并请求苏联提供援助和贷款^③。1949年1月底至2月7日，斯大林委派苏共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到中国的西柏坡，会晤中共领导人。陪同人员有伊万·科瓦廖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米高扬谈了建国方针、苏联援助等问题。同年6月26日—8月14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同样就建国、发展经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等与苏共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希望了解和学习苏联国家机关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双方商谈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政治、经贸、贷款、专家等问题，达成了许多一致意见。7月4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和斯大林递交了刘少奇签署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④。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

① 1945年10月起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就东北经济合作进行谈判。斯大林曾表示：“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见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最终，中苏未达成协议，因为很多分歧难以解决。比如，苏联坚持东北所有日本资产均为苏军的战利品；中国则坚持，所有东北的日伪工矿企业均应列为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实际上，苏军将大量机器设备拆运到了苏联。苏方谋求重要工矿企业的垄断性合伙经营权。

苏联援助中共，但不愿意冒险与美国对抗。苏联还以援助中共为中苏谈判的筹码，以争取国民政府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217。

按照海茵茨希的考证，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于6月26日抵达莫斯科（见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307页）。

报告也涉及到中国人关心的苏军驻扎旅顺口、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走机器设备等敏感问题。

刘少奇对苏军大量拆运东北工矿的重要机器设备问题向斯大林做了解释：“关于苏联从东北搬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设备原属于日本人的，苏联作为战利品将它们搬走是用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出于不让这些机器设备落到中国反动派政党手中用以反对中国人民的考虑。苏联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见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340—341页）。

表中苏双方签署了两党意义上的贸易协定（对外称苏联与中共东北政府之间的“商品交换协定”）苏方承诺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这些协议要等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才可公开。至此，中共与苏联为建立同盟关系打好了基础。

毛泽东不承认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有“中间路线”可走。在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与苏联会谈期间《人民日报》在 1949 年 7 月 1 日发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明确而坚定地宣布了中共将向苏联“一边倒”的抉择：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的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给我们钱，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想赚钱……并不是要对中国人民援助……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邓小平在 1949 年 7 月 19 日说，面对西方的封锁，共产党宁愿主动地一边倒，而不等待以后被动的一边倒^②。中方的态度无疑有助于争取苏方的信任^③。1949 年 9 月，刘少奇在北平向高级干部做报告时强调，中国必须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技术、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向苏联学习。实际上，中国“一边倒”对苏联的国际地位、安全等都十分有利。正如周恩来在开国大典前夕对苏联专家所说的：“……中国迅速强大起来，对苏联就是一种支持和壮大。”^④在经济方面，苏联产品和技术进入了中国市场，获得了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62—136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34。

③ 1949 年 7 月 6 日的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李越然，《李越然回忆录：中苏外交亲历记》，39。

被西方禁运的原材料和农产品。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后去）访问苏联。这是2月14日毛泽东、斯大林、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条约与协定签字仪式上。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为体现新中国的主权并奠定对外关系的新基础，毛泽东力争与苏联缔结一个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新条约^①以取代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为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树立榜样。而斯大林则希望与共产党中国结盟，但又不破坏雅尔塔体系和不损害苏联在东北的既

栾景河，对毛泽东首次访苏若干问题历史考察与思考。

得利益^①。双方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1950年1月2日斯大林终于派人告诉毛泽东，他同意缔结新的同盟条约^②。1月20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月14日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③，双方建立起政治和军事同盟关系。这符合中国的切实利益，更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苏联的远东安全有了保障，斯大林同意在1952年以前放弃在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的特权。毛泽东解释说：“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④

毛泽东承认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中国把苏联当成自己的“老大哥”。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第四次会议上是这样号召向苏联学习的：

要学习苏联。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现代经济的经验，经济技术落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惟有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

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愿望和结果。

斯大林做出让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要改变对华政策（见：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515—518.）。1月1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谈话中透露英国和印度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将不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努力避免卷入中国的内战。次日，英国政府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很可能在12月底就得知美国态度的转变，担心中国接近美国。

不久，双方还签订了秘密的《补充协定》。《贷款协定》和随后签订的贸易协定使1949年7月30日中苏两党层次上的所谓苏联与中共东北政府之间的“商品交换协定”变成了公开的两国政府协定，1950年协定与1949年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2。

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上的讲话，1953年2月7日。

验'^①。毛泽东、周恩来派刘晓出任驻苏联大使时说过，苏联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建设和五年计划都需要苏联的帮助^②。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又缔结了一系列的经济贸易协定。苏联政府动员人力、物力帮助中国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派遣顾问和专家，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中苏两国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到第一位。

中苏关系又与中美关系相联系。中国采取倒向苏联一边的对外政策，同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引起和加剧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排斥和敌视，坚定美国控制台湾的决心。反过来，中美关系的日趋恶化，更加深了中苏战略同盟的必要性。

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s）中文简称巴黎统筹委员会，实行对苏联和东欧的“禁运”政策。西方国家采取了孤立中国的政策，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对中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1952年9月，由北约成员国和日本参加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了一个中国委员会，定期公布对中国及其邻国禁运的“战略物资”清单。西方的贸易禁运使中国失去了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购买材料、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可能，以至于中国不得不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主要限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③。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于9月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使中国成为苏联最重要的伙伴。他想借用中国来加强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影响力，而中国则希望得到苏联更多的援助。赫鲁晓夫扩大了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援华规模，比斯大林更尊重中方的意见，在外交斗争中大力支持中国，使中苏合作关系在1953—1956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04。

② 刘晓，出任苏联大使。

③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会见两位巴西记者时说过：西方贸易禁运“并没有损害我们什么，反而使我们受益匪浅”。这帮助中国人消除了“盲目迷信外国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387—389）。

④ 50年代初期，苏联仍处于战争恢复阶段，经济上还算不上富裕。苏联领导层对大规模援华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心这会对苏联经济造成不良影响，或引起其他问题。赫鲁晓夫对此做了说服工作和批驳。

年之间达到鼎盛时期。赫鲁晓夫成为苏共领袖后的首次出访就是 1954 年 9 月 29 日率领由 70 多人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这也是苏联第一个最高级的访华代表团，成员有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等。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解决了斯大林时期中苏关系中的遗留问题，并代表苏联政府首次在中国与中方签订和宣布援华协定和议定书等 7 个文件，使中方感到自己取得了“平等地位”^②。

赫鲁晓夫坦率地承认苏联对中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并不是无私的，认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他回忆说：“我们把加强中国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保证我们东方边界的安全。”^③ 何况中国还为引进“老大哥”的技术和设备，聘请专家掏了钱。社会主义兄弟之间，更要“明算帐”。

3. 中苏国家安全的相互需要

面对美国这样的共同对手，中苏有共同的安全利益。朝鲜半岛与中国唇齿相依，同样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密切相关。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接着，美军进驻台湾，破坏了解放军进攻台湾的计划。9 月，美军进逼三八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斯大林的鼓动下，毛泽东于 10 月 8 日决定出兵援助北朝鲜，志愿军在 10 月 19 日入朝作战。苏联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做了空中掩护，向中国供应了 64 个陆军师和 22 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 20 个陆军师的装备和 375 架米格—15 战斗机是苏联无偿提供的，中国为购买其余装备和飞机欠下苏联 30 亿人民币外债^④。中国的参战是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因此消除了对中国的猜

① 赫鲁晓夫同意将斯大林时期苏联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中国，取消了中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放弃苏联在中长铁路中的权利，不必等到中苏签订对日和约就应撤出驻旅顺口的苏联军队。1956 年 5 月，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废除 1950 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这意味着苏联正式放弃了在东北和新疆的两个势力范围。

② 在斯大林时期，都是中国领导人前往莫斯科拜谒苏联领导人，在那里签订条约、协定、合同等文件。

③ 马贵凡译，赫鲁晓夫眼中的毛泽东——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一）

④ 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671。

⑤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与回顾，31—32。

疑和顾虑，开始采取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态度^①。

朝鲜战争使中国直接面对西方的军事压力，且在国际关系上的回旋余地大为减少，特别是在先进科学技术来源上的选择余地也减少。中国将更加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朝鲜战争带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它使中国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给困难的中国财政增加了很大压力。国防经费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相当大部分，直到 1952 年经济建设资金所占比重才超过国防经费^②。1953 年 7 月 27 日中朝与美国签订停战协定，美国在短时期内难以发动大规模战争，这才使中国有可能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经济建设。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备感因技术装备落后而吃亏，认为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

美国对华政策以及由此加剧的台湾海峡、朝鲜、越南的紧张局势，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中国领导人决心利用苏联的援助，加快工业化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壮大国防力量。1955 年 12 月 5 日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其大意如下^③：

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

1956 年初，中央酝酿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 15 年长远规划，当时曾设想：国防工业建设达到满足战时最大需要量的时间是 1961 年，后又改为 1964 年^④。1956 年春，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十大关系时，中国领导人分析了 1955 年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使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估计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设想将军费支出从占国家预算支出的 24% 减少到 20% 以下，15% 的样子，腾出资金用于经济建设。毛泽东提出：

① 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角度。

② 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94。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522。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47。